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6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1715 – 1787)

[法] 达尼埃尔·莫尔内 著

黄艳红 译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 – 1787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6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1715 - 1787)

[法] 达尼埃尔·莫尔内 著 黄艳红 译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 - 1787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法)莫尔内著;黄艳红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10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3654-6

I. ①法… II. ①莫… ②黄…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法国—1715~1787 IV. ①D09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706 号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

著 者/[法]达尼埃尔·莫尔内

译 者/黄艳红

责任编辑/黄 韬 殷亚平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中国上海市都市路2号楼10楼

邮购电话/24175963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410千字

印 张/33.75

书 号/ISBN 978-7-5426-3654-6/K·160

定 价/58.00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序 言

11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问世时,被视为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出版的时间是1933年,那一年,纳粹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法国经历了经济危机,斯塔维斯基(Stavisky)丑闻暴露出第三共和国的虚弱,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效仿者引起的骚动已经使得国内气氛陷于狂热。一些偏激的空论家主张继续以前巴雷斯(Barrès)和反德雷福斯派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控诉。这些空论家受到另一些人的支持,他们甚至开始指控法国大革命。达尼埃尔·莫尔内因为选择了这一课题而置身于喧嚣的现实中。但他的一大优点是排斥了论战思想。最初,这部杰出的大学学者的著作价值体现在教学方面。它训练读者如何涤清激情。浪漫主义会给历史平添引人入胜的迷人色彩。但学术知识具有另一种性质。

对于18世纪的法国,达尼埃尔·莫尔内从事的是某种类于今天的民意调查工作。这种调查工作在三十年前还几乎不为人知。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意调查已经完成了某种公共思想的教育工作:如果调查偏离了客观性的话,显然没有任何价值。尽量扩大调查范围以发挥多数法则的效用,避免过分偏重某个部分而忽略别的部分,谨防因非典型事实和文本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质而选取它们作为样本,不可提出事先就规定了答案取向的问题:这些已经是《思想起源》的研究法则了。作者特别注重这一点,即提出的问题只能是可以得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这和问卷草拟者的想法颇为相似。作者不想评判大革命,也不想评判酝酿大革命的人。大革命亲历者,或几乎与它同时代的介入者,或至少深受这一事件感

12

染的人,如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甚至米什莱(Michelet)等人,已经给出了谴责的判决或者为它发表了颂词,他们的做法并无丝毫的不合理之处。一个半世纪过去后,再去给大革命下判决就显得可笑了。当达尼埃尔·莫尔内撰写此书的时候,历史认知钟声的敲响已有些时日。当然,要得出中肯的结论,他可以在研究自己的课题时更冷静一些,这种冷静有时是奥拉尔(Aulard)、马迪厄(Mathiez)等人欠缺的,因为 20 世纪初的“共和主义”斗争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更明显的痕迹。

但这并不是说《思想起源》一书中没有任何预设观念。达尼埃尔·莫尔内真心诚意地写作这本书,书中每一页都表露出作者这样的关切:一个理性的思考者究竟应克制些什么,正如最可能的真理也应有所保留一样。毕竟在当时,关于知识的相对论思想日渐得势,其原因多种多样:特别重要的是,物理学的发展不是让人认识到,粒子的轨迹是根据观测轨迹的方式确定的吗?对于历史学家,人们应该认识到,他的史学立场即使不能对事实发生影响的话,至少也会影响到他从事实中得出的认识,哪怕这种影响是由历史认知的技术和思想工具的变迁造成的。因此,人们可以以强烈的兴趣关注世界史中某个重大事件在史家视角中的演变过程,比如博叙埃(Bossuet)、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吉本(Gibbon)、勒南(Renan)、汤因比(Toynbee)等人对罗马帝国的终结和基督教兴起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属于意义最重大的事件之列。这一点在 1933 年毫无疑义。在当时,1789 年是历次伟大革命中最近的一次,因为 1917 年的十月革命看来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意义。随后,中国的长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连续变迁夺走了这场革命的一点光彩,对于这场革命,某些人不无优越感地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

视角问题对达尼埃尔·莫尔内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他的著作之所以值得我们的关注,正是在于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已出现明显的欠缺,而起初人们对此几乎没有意识到。由于最近 30 年来各种观点的演变愈来愈迅速,这些欠缺开始显露

出来。因此,人们会奇怪达尼埃尔·莫尔内为什么仅仅全神贯注地局限于法国。在19世纪和1950年之前,类似的局限被视为令人满意的做法,因为民族心理学与历史学家探讨的对象并无关系。不过,今天的人们可能认为,仅仅以美国革命一章来论述外部因素的做法很不令人满意。达尼埃尔·莫尔内曾提到,罗兰夫人(Mme Roland)20岁时读过德洛尔姆(Delolme)的《英国宪政》(p. 466^①)。这个简短的提示使人注意到书中的一个疏漏: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应该有英国的思想和现实的一席之地。古纳尔·冯·普罗什维茨(Gunnar von Proschwitz)在谈到博马舍(Beaumarchais)的用语时指出,1780年左右法国的公众思想是如何接受从海峡对岸输入的思想方式的影响^②。仅仅从民族的视角去考察像启蒙运动这样的普世文化,难道不是很反常的做法吗?在达尼埃尔·莫尔内的著作中,竟然没有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俄国的叶卡捷琳娜(Catherine)沙皇、约瑟夫二世(Joseph),也没有启蒙时代非常出名的其他翘楚【如斯德哥尔摩的古斯塔夫三世(Gustave III),华沙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里斯本的旁巴尔(Pombal),马德里的阿兰达(Aranda),那不勒斯的塔努奇(Tanucci)】的位置,这确实让人很感意外。这些政治家代表或支持一种长期为启蒙哲人感到欣慰的、但达尼埃尔·莫尔内仅仅在几

14

处暗示过的学说:开明专制,难道他们不值一提吗?可以说,正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失败使得大革命在所难免。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段,一种旨在对国家实施理性化改革、但又不对社会进行深刻重组的政策已经过时了。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遍及整个欧洲。同样,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某种全欧性的局势,虽然它在西欧更为剧烈。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中心在1789年之后才以巴黎为中心。但革命两年前就已在奥属尼德兰开始了。

① 本书中所提及的页码,统指原法文书中的页码,即本书编码——译者。

②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vocabulaire de Beaumarchais*, Nizet, Paris, 1956.

由于最近 30 年来的史学研究,达尼埃尔·莫尔内那些稍显粗略的说法已经被进一步地充实和精确化。全书的整体构架(“最初的冲突”、“决定性斗争”、“局势的发展”)与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线性发展图式相符。18 世纪是路易十四时代末期的危机和 1787 年革命序曲之间的过渡期。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这 70 年的变迁很难说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加速运动。赫伯特·吕蒂(Hebert Luthy)着力强调说^①,这期间出现了伏尔泰所称的“路易十五时代”:这是一个恢复了平衡的时期,孟德斯鸠的全部论著和伏尔泰在希莱城堡时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一点,当时的伏尔泰试图通过《路易十四时代》来描绘一个开明君主制国家的理想图景。要想理解旧社会的这一顶峰阶段,仅仅有思想史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深入的社会—经济分析。达尼埃尔·莫尔内经常援用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痛苦的感受”(如 p. 485)和“苦难”(例如 p. 531)。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已经给予这些说法更明确的内容。正如我们在《思想起源》(p. 494)中看到的,的确是贫苦人组成了“革命大军”。

- 15 对于群众的研究证实了莫尔内的印象,虽然他使用的文献不多,但这种印象没有错。在法国和欧洲,大革命前的人口革命使得革命成为必然。由于死亡率的降低,这个王国的人口增长了 30%—40%,但生产并没有跟上,甚至远远没有跟上。需求的增长以及同时出现的金属货币的增加导致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②,大量无以为生的人涌向城市,农村则遍布乞丐和强盗(18 世纪也是卡尔图什(Cartouche)和曼德兰(Mandrin)的世纪^③)。价格的走高也大大推

①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t. II, Paris, 1961.

② Ernest Labrousse: 《Le XVIII^e siècle produit à lui seul autant d'or et d'argent qu'on en a extrait jusque-là, depuis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Le Dix-huitième siècle, PUF, Paris, 1959, p. 346.

③ 卡尔图什和曼德兰是 18 世纪法国著名的强盗,民间传说中的侠义之士,卡尔图什 1721 年在巴黎被处死,曼德兰(1725—1755)活跃于多菲内一带,以攻击总包税所等税务机构而闻名——译者。

动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因此获益^①，这个富裕起来的阶层企图控制这个他们以税收供养的国家。另一方面，产权体制促使地租上升，大量无地农民陷入贫困化。从那时起，受益阶层的繁荣和大众日益加剧的贫困之间产生了革命性的矛盾。在一个依然以“等级制”为组织原则的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被置于下层地位，他们的意图与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城乡无产阶级的自发意愿不谋而合。在经济萧条时期，一个歉收年（1788年）就足以使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推翻整个体制，而这种不满在几个月（1789年5—6月）的阶级联合中得到群众推动力的支持。

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提出的分析^②，阐明了达尼埃尔·莫尔内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解释的事实。1763年前后席卷奥顿市民的“奢侈狂潮”（p. 257）可能只有道学家们感兴趣，但这个现象显然表明，人们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作一些阐释。同样，1780年 16
前后中小学学生数量的下降（p. 364），其主要原因不是对教学的不满，而是“爆发于1776—1777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恶化、几乎一直维持到战后”^③的经济萧条的结果。

达尼埃尔·莫尔内列举的例子（p. 181）表明，商人并未涉足外省科学院。这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一点。《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这样的著作令人想起雅克·普鲁斯特（Jacques Proust）关于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社会背景的研究^④。莫尔内有充分理由断言“言语中的辩论与法国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p. 485）。对这一“现实生活”的经济事实和社会结构应该作进一步的考察。

① Ernest Labrousse, *op. cit.*, p. 345: “在1725—1775年之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以上。”

② 前引书，pp. 347—362.

③ E. Labrousse, *op. cit.*, p. 358.

④ 见该作者的两部著作：*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A. Colin, Paris, 1962; *L'Encyclopédie*, A. Colin, Paris, 1965.

相比而言,达尼埃尔·莫尔内的著作突出了一个视角的必要性,而这个视角正是 20 世纪 30—6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角。莫尔内所创造的历史“思想起因”概念引起了很多评论和反对意见。当他提出这样的结论(p. 26):“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思想观念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时,难道他不是事先就把结论限定在课题之内了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种迟疑。有时,莫尔内不自觉地继承了泰纳(Taine)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虽然他断然拒绝泰纳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釋。他试图给予思想以鲜活的生命和对事件的直接影响力。“大革命中伏尔泰式的不信神思想和焦虑感”,他有过这样的说法(p. 388)。但在别的地方,一种十分正确的历史相对论又使他感到踌躇:“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事件,事件正是通过舆论才产生了深刻的反响:开明阶层的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界的引导和左右”(p. 439)。这种犹疑态度富有远见,它提出请人们将分析推向深入。我们应该认同达尼埃尔·莫尔内的看法,把 1748—1770 年间的政治不满归因于普遍存在的“苛政”,后者“因为人们知道去反思这些苛政”(p. 171)而变得难以忍受么?但为什么人们“学会思考”了呢?是启蒙哲人的教育产生的影响吗?那毋宁说是因为经济和人口变迁使得人们开始倾听推理者的理论了。宣传只有在有利的土壤上才会发生效应。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土壤才会出现这样的宣传。当达尼埃尔·莫尔内在其著作的末尾说出这样的话时,我们看来可以赞同:“这种思想要产生行动,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这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政治上的困境。不过,政治因素可能还不足以……”(p. 531)。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说法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思想某种意义上外在于现实,虽然前者要在后者内部寻找“支点”。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观念是原因还是结果?阿尔方斯·杜普隆(Alphonse Dupront)评论说^①:“与事件相比,书籍和集体心态都是滞后的。换言之,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书籍不是事件的创造

①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La Haye, 1965, p. 210.

者；书籍的作用在于为事件提供意识、确定地位、通常还为它提供论证。”要确定历史中的思想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无疑是回过头去寻找一个虚假问题的答案。当人们提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的“表达”时，就可以摆脱这种纯属语言问题的困境。因此达尼埃尔·莫尔内在谈到18世纪的教育改革计划时这样说道(p. 375)，所有这些骚动并不是“原因”，而是一种“征兆”。

平心而论，这部1933年问世的著作在一个学科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另一些角度看，它仍是一部不可取代的论著。在对18世纪的总体研究中，《思想起源》一直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完整、最丰富的广博作品。这样的评价还远远不够。人们至今还惊叹于这样一部著作所要求的广泛的阅读面。后来莱斯特·G. 克罗克(Lester G. Crocker)进行的宏大的综合性研究根本没有让该著相形见绌，毋宁说只是达尼埃尔·莫尔内研究的准备阶段^①。后来的研究只是对这部500页的全景式画卷中短暂提及的某个方面作了进一步澄清。今天，我们已经对18世纪的幸福观念、自然观念和人生科学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②。其他的研究也应深入下去。虽然雅克·普鲁斯特和J. 劳夫(J. Lough)已经发表过出色的论著，但关于《百科全书》在外省的传播状态仍有待研究。卢梭的影响及其意义同样如此：据说一位名叫蒙洛奇(Montlosier)的人以反革命的方式来理解让-雅克的思想(p. 456)，这样的例子应该不是孤立的。最近让·法布尔(Jean Fabre)先生的著作^③指出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意义。

18

① Lester G. Crocker, *An Age of Crisis. Man and Work in the XVIIIth Century Thought*, Baltimore, 1959; *Nature and Culture: Ethical Thought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Baltimore, 1963.

② R. Mauzi, *L'Idée de bonheur au XVIII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0; J. Ehrard, *L'Idée de nature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 siècle*, Chambéry, 1963; J. Roger, *Les Sciences de la vie dans la pensée française du XVIII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3.

③ *Lumières et romantisme : énergie et nostalgie, de Rousseau à Mickiewicz*, Klincksieck, Paris, 1963.

《思想起源》中提到的几则材料属于印象式的评论,仍有待证实。1778年加入勒芒文学社的勒普兰斯·达尔德奈(Leprince d'Ardenay)在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孟德斯鸠、布丰(Buffon)、伏尔泰和卢梭的名字(p. 257);1751年,达尔让松(D'Argenson)侯爵抱怨本省居民“变得日益野蛮”(p. 332)。然而,1778年,达尔让松家族领地(今天的安德尔-卢瓦尔省)上的教区神父穆泽(Mouzay)在他的登记簿上记录并评论了伏尔泰和卢梭的死。我们应该认为

19 达尔让松很不了解自己领地上的教区神父吗?或者说,1751年—1778年之间的乡村局势发生了变化吗?究竟是这位神父的好奇心、还是这位勒芒的回忆录作者的冷漠应被视为反常现象呢?不久前,有人以现存的教区登记簿为素材,采用计量方法对18世纪的军队招募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相当出人意料的想法。

达尼埃尔·莫尔内正是这种今天已广为使用的史学方法的先驱者。对文本“史料”的研究自然引向对舆论的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1909年对伏尔泰《哲学通信》的编订中已看到此类研究的范例:如果伏尔泰真的读过其编辑者参阅的所有书籍,那他绝不会写出《哲学通信》。此外,人们提出的一些文献比照看来并不能让人追踪到思想“来源”,不过就伏尔泰涉及的问题来说,这些比照工作倒是能澄清当时法国或英国的舆论状况。这样一来,大量的卡片工作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此前的一些嘲笑也就销声匿迹了。这种方法被视为“朗松”学派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它与学术研究的手工阶段相适应,但它也为“集体项目”研究、为穿孔卡片的“信息化”处理开辟了道路。计算技术受信息分类的限制。但只有这种技术能让人有效地理解民意调查中碰到的大量现象。此外,半个世纪以来,达尼埃尔·莫尔内曾使用过的私人藏书研究^①不断有后续者,这本身是对计算方法的诋毁者的一个回应。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这类研究更具决定

① 《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juillet-septembre 1910.

性意义。它们不仅论证了作者的结论,而且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的方法论作出了评判。先构建出某种解释,然后巧妙地装点一些倾向性的细节材料:这样作者就能省去麻烦。此类捷径可以让才子们展现其激情,让文笔更为绚丽。但是,这也使得作者易于产生偏见:正如莫尔内指出的,泰纳主意已定——这位“泰纳先生”,这位因1870年的灾难而深受创伤的爱国者、一位对巴黎公社深感震骇的保守派,他急于驳斥这些灾难的责任者。因此,《现代法国的起源》应在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想要了解18世纪历史的人大可忽略泰纳的论点。

相反,达尼埃尔·莫尔内的作品因其自身价值和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未失其意义。在最近出版的一部集体文集的开头,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宣称文集的意图是“继续达尼埃尔·莫尔内曾发扬光大过的计量传统”^①。此外还有对18世纪出版业的研究,它实际上是对《思想起源》的继续,该研究对“特许出版物”和“默许出版物”作了分类考察;对《学人报》和《特雷武报》两种内容各具特色的报纸的研究;对小贩叫卖文学的盘点;对外省科学院成员的分析^②;还有R.艾斯迪瓦尔(R. Estivals)的研究^③。与此同时,一些雄心勃勃的研究团队已开始对达尼埃尔·莫尔内著作中蜻蜓点水或仍付阙如的工作展开大规模研究:如对18世纪法国的期刊出版物进行系统详尽的整理,出版关于主要作家的辞典,对陈情书进行语义学分析,等等。不久以后,当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数据后,我们将能了解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

当然,数据并不能说明一切,而且普通大众不全可以纳入计量的范围。有些人过多地扮演着那些没有留下言语、也不大会思考的群众的代言人,我们将能克服这种浪漫主义的诱惑。历史学家

①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 1.

② 见上引书,F. Furet, J. Ehrard, J. Roger, G. Bollème, D. Roche的论文。

③ *Le Dépôt légal sous l'Ancien Régime*, Rivière, Paris, 1961; *La statistique bibliographique de la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Mouton, Paris, 1965.

- 21 应该预先假定人的生物存在的优先性吗？毕竟大多数人的个性只是附加现象，与生物性相比，这种个性根本不具备同等的地位，也不具有互换性。但毕竟有人在思考，人们毕竟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作家的功能正是以文字表达来启发他的读者去思考和感受。长期与法国文学打交道的达尼埃尔·莫尔内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各项优点之中，有一项是其在罗列的同时考虑到了定性分析。在各类统计数据中，他注意刻画一些男女人物的形象。还需谨记的是，如果不是在该书中看到一些出色思想者的话，可能这些人在一个世纪以后也不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

René Pomeau

导 言

在这部著作中，我打算描述的是大革命的思想起源史，而非革命观念的历史。自从人类过上社会生活并开始思考后，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等观念大概就已出现，虽然它们多少都带有一些模糊色彩。所有这些观念，其产生、阐明和评论均始于古希腊。要想撰写它们的历史，就特别需要追踪许多世纪以来的重要著作和重要思想家；因为，只要这些观念还没有实现，给予它们持久的形态、对它们进行传播和改造的正是这些伟大著作。但我所选择的课题完全不同，因而也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

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总体性的视角，会发现三种类型的革命：第一种是贫困和饥饿导致的革命，这是不堪忍受残酷生活的人们发起的混乱起义，起义的动力来自贫困和盲目的怒火，这种革命导致的是无政府状态和血腥的镇压；第二种是聪明而大胆的少数人的革命，他们在攫取权力后，引导和支配着此前一直漠然而迟钝的大众；而在最后一种革命中，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是规模十分可观的少数人——他们多少已有些见识——已经意识到政治体制的缺陷，并构想他们所期望的改革，于是他们逐步引导公共舆论，并获得或多或少地合法权力；群众也会跟随他们，因为群众至少模糊地懂得并青睐于某些观念：革命正是以这些观念的名义进行的。毫无疑问，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属于第三种。跟以往的革命一样，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因是政治方面的；人们希望进行变革，因为人们的处境很不幸或自认为是不幸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事先有过思考的话，人们可能下不了变革的决心，而且肯定不能决定变

24

革的手段和目标。这样的思考并不是几个大胆人物的事情，它是人数十分众多的精英的事业，他们在法国各地致力于探讨弊病的原因和救治弊病的根本办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至少初看起来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正是要探讨思想在大革命的酝酿中所起的作用。重要的作家有哪些观念？二流、三流乃至十流作家的看法又如何？因为，有时在我们看来属于十流的作家，在当时人看来却是一流的。这些作家如何对普遍的公共舆论、对那些非文人的普通群众产生影响？思想传播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从最有文化的阶层向下深入，经资产阶级、小市民一直传到百姓中间？以及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从巴黎传向最遥远的外省？总之，不可胜数的众多法国人是如何考虑深入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的性质？

25 这项关于思想传播的研究需要一种复杂而宏大的步骤。我们始终要考虑年代问题；同一观念的影响力在1720年、1760年和1780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把这个世纪分割成太多的阶段。我的看法是分为三个自认为合适的阶段：1715—1747年；1748—1750年之间出现了图桑(Toussaint)的《品行论》，《论法的精神》，布丰(Buffon)的《自然史》的头几卷，《盲人书简》，《百科全书》的出版计划和开篇论文(第一卷于1751年出版)，卢梭的第一篇“论文”，等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转折。但第二个时期(1748—1770年)则远不如第一个时期那样明确，但毕竟还要划分一下；思想表达工作的完成和大规模传播的开端始于1770年左右。我们的研究将揭示这一点。【例如，正是在1764年和1770—1772年间，伏尔泰(Voltaire)和霍尔巴赫(Holbach)发表了他们最富论战性的作品。】

我们的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太多此类题材的历史著作都犯有一个严重的错误，或曰它们都带有一种很大的风险：这就是“所有人”、“到处”之类的提法，然而对于它们应了解的所有人，它们实际上只有半打证据。我对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不抱幻想。它是很不全面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分析了巴黎各图书馆馆藏的外省报纸；我还查找了5个外省城市收藏的报纸；本来我还应该继续在至少8个